

中国小说现代转型的历史性出场

——“问题小说”新论

刘 勇¹, 龙泉明²

(1 武汉工业学院 人文系, 湖北 武汉 430023 2 武汉大学 中文系,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 问题小说创作热,作为新文学运动早期的一个突出的文学现象,不应该从“文体”和“题材”的角度来理解,而应该看问题小说在处理“问题”与“小说”的关系上,在哪些方面超越了中国传统小说和近代小说。问题小说展示一种新的小说观,并初步确立了一种新的提问法则和提问的自主性,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关键词] 问题小说; 提问法则; 自主性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04(2005)03-0069-05

一

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在小说创作上最初的社会性成果,就是出现了一批“问题小说”。由于这些小说大多没有以合乎艺术规律的方式呈现“问题”,并存在取材范围狭小的局限(主要是爱情婚姻家庭题材),因此一般认为问题小说的创作热,并非实验一种新的“文体”,而是新文学起步时期一个小阶段的“题材热”,这些论断值得反思。

首先,问题小说的倡导者本就无意用“问题小说”来指称一种新的小说“文体”。较多使用这一概念的周作人就提出,问题小说“是近代平民文学的出产物。这种著作,就是论及人生诸问题的小说。”他还特别强调:“中国从来对于人生问题,不大关心,又素以小说为闲书,这种小说,自然难以发生。”^[1]细察之,周作人是从作者对小说本质和功能的设定的角度,或简略地说是从小说观的角度来确定“问题小说”属性的,并且是用来与“素以小说为闲书”的小说观对质的。站在更广阔的视野上来看,从文艺观的角度来确定新旧文学的根本属性,也是当时新文学工作者一个十分普遍的思想立场,如茅盾当时就提出:“我们要在现代小说中指出何者是新何者是旧,唯一的方法

就是去看作者对于文学所抱的态度;旧派把文学看作消遣品,看作游戏之事,看作载道之器,或竟看作牟利的商品,新派以为文学是表现人生的……凡抱了这种严正的观念而作出来的小说,我以为无论好歹,总比那些以游戏消闲为目的的作品要正派得多。”^[2]新文学工作者之所以如此注重“作者对于文学所抱的态度”,是因为他们在批判以“黑幕派”和“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旧文学时,把焦点对准了这些作品所由产生的文艺观——新文学工作者将其归结为“游戏消闲”的文艺观。相应地,他们也把树立“严正的观念”作为新文学建设的一个中心课题。可以说,树立“严正的观念”是当时文艺理论建设活动、文艺创作实践活动和文艺社团组织活动的一个根本的推动力。其中,倡导作家站在理智主义和客观主义的立场上,以自主的姿态严肃地观察和思考各种社会人生“问题”,是他们将“严正的观念”落实到创作实践上的一条重要的道路。可见,周作人从小说观的角度来认识“问题小说”,并非是他个人一时的看法。

因此我们应看到,作为一个主要指涉小说观的概念,“问题小说”规定的只是创作主体如何处理题材,而不是选取什么题材。问题小说的创作

[收稿日期] 2005-02-20

[作者简介] 刘 勇(1966—),男,湖北武汉人,武汉工业学院人文系讲师,武汉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龙泉明(1951—2004),男,四川武胜人,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

出现了题材趋同现象,另有社会的和作者个人的原因,并非是这种新小说观本身决定的。就可能性而言,这种新小说观还可以选取无限多样的题材来实现自身。因此,用题材来把握问题小说的创作热,是难以说明这一文学现象的实质的。

其次,说问题小说创作热是新文学早期的一个小阶段,诚然有助于说明新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但也容易遮蔽问题小说与以后的小说,特别是现实主义小说一脉相承的一面。其实,问题小说所取法的易卜生戏剧和19世纪俄罗斯文学,本身就是以现实主义文学为主的。它们思想艺术上的丰富性,是问题小说这一概念无法涵盖的,只是最初中国文艺家在接受这些文学时,片面地突出了其中的社会问题意识,如茅盾曾说:“俄国文豪负有盛名者,一定同时也是个大思想家。我们只看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无抵抗主义,都是表现在文学中的……有了这种哲学思想做根据,然后他的文学能成名……从前的文学家每想用艺术——实在是卑劣的艺术手段——来遮掩他无理想无哲学根据无浓厚表现人生的感情。现代的俄国文学家都不取了。”^[3]把托尔斯泰的创作思想说成是“人道主义无抵抗主义”,不仅极大地简化了其丰富性和深刻性,也过于突出了“主义”在创作构成上的地位(周作人也曾把托尔斯泰的小说称为“主义的小说”)。应该看到,这种接受上的片面性,在当时是较普遍的。在中国文艺家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学的过程中,有一个带一定规律性的现象,就是他们在初次面对一种西方文学现象时,往往依据特定的现实需要,先抓住其中的某一侧面,并将其从自身的系统结构中抽离出来,作为改造旧文学、建设新文学的突破口,然后再在新的矛盾的推动下逐步克服这种接受上的片面性。中国新文学工作者在接受易卜生戏剧和19世纪俄罗斯文学时,就体现了这一规律:为对抗“素以小说为闲书”的旧观念,他们首先突出了“问题”、“主义”在这些作品创作上的地位。随着这种观念在创作实践上暴露出愈来愈多的问题,他们也就愈来愈重视这些作品所体现的现实主义艺术规律了。因此,从问题小说到以后写实主义小说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对同一借鉴对象,在认识上逐渐走向全面和深入的过程。

二

要认识问题小说创作热的实质及其文学史意

义,关键要看问题小说在处理“问题”与“小说”的关系时,在哪些方面超越了旧小说,取得了新突破。从这一角度来看,问题小说创作热的文学史意义,就在于它们在创作实践上展示并初步确立了一种新的创作意识。这种新的创作意识可以概括为:作者应该在繁复的社会现实里,自主地开掘和思考各种社会人生问题。历史地看,在中国文学史上,这种创作意识的普遍成熟和实现,是以问题小说的历史性出场为标志的。

要说明这一点,就要将问题小说放在中国叙事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来审视。中国小说艺术经历了一个漫长复杂的演变过程,当中国文学与西方近现代叙事文学发生了广泛深刻的联系之后,中国小说就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自身固有的轨道,在一个全新的知识—价值体系里获得发展了。也正是通过学习和借鉴西方近现代叙事文学,中国小说才确立我们上面提到的新的创作意识。

德国著名文艺学家埃里希·奥尔巴赫在描述西方小说观念的深层变迁时曾指出,西方古典小说一般只是从“个人道德”的角度提出“问题”,因为那时人们认为在现实背后存在着一个“永恒的道德世界”。而西方现代的小说家则具备了一种新的“现实观”,其核心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提出精神及物质方面的问题”。他以古罗马作家佩特罗尼乌斯的一部作品为例,指出这部作品虽然提及商品和金钱,但读者却感受不到“任何能使我们从经济—政治关联中理解的事物”,而一个现代的佩特罗尼乌斯则“会把对黑市商人的描述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通货膨胀联系在一起。”这也就是说,从“历史发展”或“经济—政治联系”的角度,在社会现实领域内开掘问题,是一种较为现代的创作立场。^[4](P 28—56)从逻辑上说,一旦作家从永恒的道德世界转向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就会发展一种提问的自主性。英国文艺学家伊恩·瓦特恰好对此作了深刻的说明。有意味的是,他也是在洞察西方叙事文学深层变迁的基础上阐明这一点的。他指出,18世纪以前,西方叙事文学主要是“运用无时间的故事反映不变的道德真理”,因为当时人们认为现实背后的“大自然是基本上完整不变的。”而现代叙事作家则空前重视人物、事件的时空具体性,原因就在于他们坚信“个人通过知觉可以发现真理”。^[5](P 17—30)从我们的论旨来看,奥尔巴赫和伊恩·瓦特实际上指出了现代作家是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处理“问题”

与“小说”的关系的,即他们不再是去分享既有的意义世界——已公共化了的“不变的道德真理”,而是在具有时空具体性的现实生活中,以前所未有的主体精神来开掘“问题”的。

这种提问领域与提问法则的变化,还催生了新的叙事结构原则。由于传统小说里的“问题”是从人们熟知的道德观念出发提出的,因此,作者无须刻意地去突出这些“问题”的寓意,读者也常常对它们视若无睹。这导致了传统小说的作者和读者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小说故事情节上。相反,由于现代小说所包含的“问题”是从最直接的社会感性构成中开掘出来的,是从作家个人的经验独特性和反思独特性中提炼出来的,因此,这些“问题”的深刻寓意往往不为人们轻而易举地领会。奥尔巴赫指出,这使现代作家不得不把故事情节的“感官性过程”放在次要的位置上,转而突出饱含“问题”的“场景片段”,并使这些场景片段与作品寓意建立起一种“立体联系”。这样,现代小说家不再以面面俱到、着墨均匀的叙事模式平面铺开故事情节,而以“硬邦邦”的场景片段为主干,来突出“问题”的寓意。奥尔巴赫指出,若单论故事情节,现代小说往往是平淡无奇乃至阴郁沉闷的,一点也不吸引人。但这些小说却以压制情节的“感官性过程”为代价,使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到了“故事意义的关联上”。^[5]对现代作家来说,衡量作品价值的关键,不在于故事情节是否吸引人,而在于作者是否能以自主的姿态,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提出重大、深刻、新颖独到的“问题”。

奥尔巴赫和伊恩·瓦特所描述的西方叙事艺术深层的变迁,在人类叙事文学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原因就在于西方现代叙事艺术的理念和手法,随着西方文化的扩张,不断地产生世界性的影响,中国近现代文学也深受其感染。而此前的中国古典小说,的确主要是从既有的道德观念出发来提出“问题”的。对此,周作人早就指出:“中国人向来以道德第一自命,大抵喜欢作教训小说……教训小说所宣传的,必是已经成立的,过去的道德。”因此,它与问题小说的重大区别就是“一个是重申旧说,一个是特创新例”。^[1]而且,中国传统小说是依据“正史”来自我定位的。由于正史占据了书写“大事”的空间,留给小说的主要是灵怪、公案、胭脂粉等描写领域。因此中国传统小说往往也就把“资谈笑”,即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和窥探欲等感官性需求作为一个重要的功

能。朱自清曾指出:“在中国文学的传统里,小说和词曲(包括戏曲)更是小道中的小道。就是因为是消遣的,不严肃,不严肃就是不正经;……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意在供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倒是中国小说的正宗。”^[6]中国传统小说定位方式和创作立场,体现在叙事模式上,就是为新文学所诟病的“四柱帐”(矛盾语)的叙事模式。总之,中国传统小说所包含的问题和意义是取自“旧说”的,其艺术构成又是以“感官性过程”为重心的。

三

中国小说能否通过自身内在矛盾的发展,产生一种在具体的社会现实里自主开掘问题的创作意识?从历史事实来看,这种新的创作意识在中国小说里的广泛出现,是离不开西方近现代叙事艺术的影响的。当然,中国文艺家对西方近现代叙事艺术的理念和手法,在认识上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最初,中国文艺家首先注意到的是西方现代小说最直观的层面——叙事模式。这主要发生在近代文学时期。当时许多中国文艺家对西方那种以场景为主干的叙事结构感到很新奇,并在创作实践中加以借鉴。到了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中国文艺家又被西方近现代小说在社会现实里自主开掘种种严肃问题的创作精神深深地震动。就外部的社会条件而言,这一时期恰好是对传统“不变的道德真理”充满怀疑和批判的时期,是个性意识和理性精神普遍高涨的时期,是人们对种种社会人生问题充满困惑并力求自主地寻求答案的时期。因此当时的文艺家不仅呼吁作家彻底告别搜奇志异、炫耀才情、攻讦隐私等创作动机,严肃地探究各种社会人生的问题,而且特别强调,这种严肃的探究应该充分地体现作者“自己的遗传和环境,自己的地位和经验,自己对于事物的感情和态度”。^[7]以后,中国文艺家日益关注这些自主开掘的“问题”的艺术呈现方式,突出强调了这些“问题”的呈现必须遵循现实主义的客观性叙事原则。这构成了中国文艺家对西方现代叙事艺术的理念和手法认识上逐渐深入的粗略路线图。从这一角度来看,问题小说的创作热,可以说就是在对西方现代叙事文学一个特定的认识阶段上出现的一次充满探索热情的创作实验。

值得注意的是,问题小说与中国传统小说在提升自身品格的方式上也有重大区别。传统小说几乎把攀附“正史”和正统“诗文”作为提升自身

品格的唯一渠道(这一点在许多近代小说中体现得是很充分的)。虽然一些问题小说,如《斯人独憔悴》、《海滨故人》等,也带有这样的特征(引入诗文),但从总体上说,问题小说更趋向于依据“哲理”、“问题”等来自自身的内在品格,如胡适早就把“思想”作为文学的本体构成要素之一,并提出“文学以有思想而益贵,思想亦以有文学的价值而益贵也。”^[8]以后,周作人、冰心、茅盾、叶圣陶、瞿世英等人也都一再强调“思想”、“哲理”、“主义”在小说创作中的重要地位,强调小说创作应体现出作者独具个性的、“固定的”、“在‘水平线上’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一时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声势。许多问题小说的作者,如冰心就把自己创作小说的缘起,归结为“懂得小说里是哲学的”。^[9](P125)]这就体现了西方叙事文学传统的影响。与中国传统小说不同,西方叙事文学是依据哲学来定位的。瞿世英在论证“创作应当以哲学为本质”时,就引用了亚里士多德“诗是一切作品中最哲学的”论述,指出这已“将‘诗与哲学’的问题提出来了。”^[10]由于西方哲学是建立在主客体二分和对世界的现象、本质二分之上的,因此西方叙事文学也主要是站在理智主义和客观主义的立场上,以独立超越的认知理性,来模拟、观察和思考社会人生的“真理”。这一传统也为坚持理性反映论的西方近现代现实主义文学所继承,特别是易卜生戏剧和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都擅长于从社会生活现象中提出意义深广的问题,并将其提升到历史哲学和人生哲学的高度。这种审美取向符合了新文学的需要,具有对抗“以小说为闲书”的力量,因而得到新文学工作者的普遍重视。

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问题小说展示并初步确立了一种与传统小说、近代小说不同的小说观和创作取向。首先,问题小说体现了作者开掘“问题”的自主性。尽管在今天看来,许多问题小说如《海滨故人》,所涉及的问题仍取自传统文学经常表达的主题(人生易老、生命有限等),但许多作品的“问题”是发前人所未发的,如《苦菜》(叶圣陶),通过一个被生计所迫的农人与小知识分子的“我”对田间劳动的不同感受,对人们“怠业”的原因作了心理上的解释,隐约地切入自由、劳动与美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也较好地与个人独特经验与反思结合起来,将问题推向了细致和深入。正因为这样,鲁迅指出这些创作“上海的

小说家梦里也没有想到过。”^[11]其次,问题小说大多是截取了一些充满“问题”和“意义”的片段场景来展开叙事。这一特点最显著地体现在叶圣陶创作的一些问题小说之中。如《一生》不仅没有讲述完整的故事,甚至主人公的姓氏籍贯这些旧小说必须首先交代的因素,都模糊不清。但作品却通过主人公一生中几个最能够显示“问题”和“意义”的片段,对剥夺人们“自己的主见”的宗法制度提出了深刻批判。第三,问题小说是本着“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提出精神及物质方面的问题”的原则提问的。周作人曾提出:“我们最要注意的点,是人与社会交互的关系;换一句话,便是人的遗传与外缘的关系。中国人的根性怎样?他们怎样造成社会?又怎样的被社会造成?”^[12]周作人把如此众多而重大的问题都放在了人与“社会”的交互关系,而不是人与先验的道德世界的静态关系中来审查,显然就是新“现实观”的产物。

四

由于问题小说毕竟出现在中国文艺家对西方近现代叙事艺术的观念和手法的认识尚欠深入的阶段,因此问题小说创作也就暴露了种种不足。如前所述,这一时期的中国文艺家在接受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和易卜生戏剧时,虽然超越了单纯关注西方近现代小说表层叙事模式的局限,却又急剧地向“哲理”、“问题”倾斜,忽略了其他相关的艺术规定性。的确,俄罗斯文艺家十分强调在创作中提出重大社会问题,如别林斯基就曾提出:“如果一部艺术作品只是为了描写生活而生活……如果它只是痛苦的哀号或者喜欢的颂赞,如果它不是问题或对于问题的解答,那么,对于我们时代说来,它便是一部僵死的作品。”^[13](P575)]但别林斯基也十分强调“典型化”、“客观性”等现实主义原则,而且在世界文学范围内,他也是最早突出“形象思维”的极端重要性的。因此,在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那里,强烈的社会问题意识,是与形象思维和典型化、客观性原则交融在一起的。而在问题小说出现创作热潮的时候,别林斯基的这些文艺思想还不为中国文艺理论界所重视。因此问题小说作者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文学掌握世界的特殊性。如叶圣陶的《苦菜》就依靠“推衍”、“归纳”,得出一个“公式”:“凡是从事 X 的厌恶 X”。但艺术显然不是以“推衍”、“归纳”、“公式”等抽

象的理性形式掌握世界的,而是通过形象、情感、意境等,以审美的方式掌握世界的;它不是诉诸人们的理性功能以获得明晰的观念,而是发挥文艺形象的优势,在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张力结构中,获得丰富的主题蕴涵。

所以,问题小说自身的“问题”,也只能通过强化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的特殊性才能解决。由于问题小说取法的主要是现实主义文学,因此,强化现实主义的艺术规律,就成为了解决问题小说之“问题”的一个重要方向。茅盾等人在这方面作出了艰苦的努力,他们通过对一些西方小说,特别是一些俄罗斯杰出的小说进行深入的介绍,通过引进自然主义的文艺观念和方法,突出地强调了现实主义的客观性原则。而在创作界,王统照、叶圣陶等问题小说作家,也不断强化着现实主义的艺术规律,这些已为人们所熟知,无须在此赘言。值得强调的是,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学主要是在呈现“问题”的方式上超越了问题小说,但却继承了问题小说所体现出新的提问法则和提问的自主精神。从中国现代主流文学的发展历程来看,以后文学的发展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问题小说所展现和确立的新小说观的基础上,不断拓展开掘问题的领域,强化问题的丰富性和深刻程度,完善呈现“问题”的艺术方式的过程。只是由于这些创作所开掘的问题不再那么单薄、透明,不再那么脱离文学性的描写而显得突兀,人们也就不把这些创作看作是狭义的问题小说了。

[参 考 文 献]

- [1] 周作人.中国小说里的男女问题[A].陈子善,张铁荣.周作人集外集:上册[C].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299
- [2] 茅 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A].盾文艺杂论集:上册[C].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
- [3] 茅 盾.俄国近代文学杂谈[A].贾植芳.文学研究会资料:上册[C].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320
- [4] 埃里希·奥尔巴赫.摹仿论[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 [5] 伊恩·瓦特.小说的兴起[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 [6] 朱自清.论严肃[J].中国作家,1947年创刊号.
- [7] 冰 心.文艺丛谈:(二)[A].贾植芳.文学研究会资料:上册[C].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69
- [8] 胡 适.文学改良刍议[J].新青年,1917-01-01
- [9] 杨 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 [10] 瞿世英.创作与哲学[A].贾植芳.文学研究会资料:上册[C].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152
- [11] 鲁 迅.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致孟真[J].新潮,1919-05-01.
- [12] 周作人.论“黑幕”[A].陈子善,张铁荣.周作人集外集:上册[C].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287.
- [13] 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责任编辑 潘亚莉)

A New Approach to Problem Novels

LIU Yong, LONG Quanming

(1. Department of Liberal Arts, Wuhan Polytechnics, Wuhan 430023, China; 2. Chinese Depart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The proliferation of problem novels as an outstanding culture phenomenon of the early stage of the New Literature Movement should not be interpreted in the view of style or "theme". Rather, the focus should be on the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of "problem" and "novel", and the aspects in which they had exceede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novels and latter-day novel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problem novels had demonstrated a new view of novel, established a primary new mode and self-assertion of problem presenting, and which plays such an important role as laying down found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Keywords: problem novels; field of problem presenting; self-assertion